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语言的困境与突围

——文学的信意关系研究

YUYAN DE KUNJING YU TUWEI
WENXUE DE XINYI GUANXI YANJIU

张苗 著

语言的困境与突围

——文学的言意关系研究

YUYAN DE KUNJING YU TUWEI
WENXUE DE YANYI GUANXI YANJIU

张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的困境与突围：文学的言意关系研究/张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004-8617-6

I. ①语… II. ①张… III. ①文学语言-研究 IV. ①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0293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邀编辑 丁国旗

责任校对 刘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由于我近几年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文学语言的研究上，张苗做了我的博士生，也就把论题定在了这方面，当然，更主要的是她自己也感兴趣。

文学作品是艺术作品，同时也是语言作品，这就注定了文学的双重本质。文学不仅以语言为工具，同时还以语言为目的，这是近几年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之一。张苗从言意关系入手，试图融汇中国传统语言哲学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理论之思，让中国古代的儒、释、道与西方现代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语言哲思展开碰撞，综合辨析中西言意问题的理论渊薮与新近发展，从语言哲学和文学本体论的层面，立足于文学话语言意关系而俯瞰：

1. 言与意之间矛盾与张力的本源。
2. 位处“世界—人—语言”这一图式中的交叉核心，文学的言、意关系之特有结构。

在一般话语的言意结构中，张苗特引入尚不为人重视的“象”范畴，打破一般话语的言意二重性，突出“象”层次在文学话语中的地位和作用，以“象”层次来扩展“言”与“意”之间的中间域，构建起文学话语不同于普通话语的特有的审美层次结构。而以“象”、“象思维”这一人类共通的形象直觉的思维方法，连缀起古今中外各种不同诗性的现象直观方法，如中国周易的“观物取象”、禅宗的“现量直观”与康德的“智性直

观”以及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二人各自不同的“现象学”运思，结合起来综合考察，可深化人类这一共通的形象直觉思维方法的美学体认。

张苗读硕阶段，就有意于语言问题，攻博期间，仍着意于此。因为是在职读博，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一边完成学业课程，一边还能在论文写作中达到理论预期，实属不易。我深知此一论题的障碍重重，曾劝她改换题目，但她还是咬牙啃下了这块硬骨头，颇慰我心。又闻省规划办将此列入优秀成果予以资助出版，尤遂人意。愿张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事业日进，学术丰收。

金健人

于吟泉北窗

2009年12月15日

导 论

历史上有关言意问题的论述思想十分丰富，而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语虚构活动，对此问题的探讨尤显出直接意义。事实上，从古至今，从中国到西方，关于语言文字表意的局限性都有着清醒道破。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在作者创作与读者阅读之间总存在思想与表达、经典书写与理解及阐释之间的矛盾，这成为贯穿古今中外文学活动挥之不去的永久困扰。语言本身是有限的，它既可以成为交流的工具，也有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它既有可能把内在的思想表达得太多或表达得太少，在此过程中，思想可能被遮蔽、扭曲甚至于变异。而文学又面临着如何超越语言的普遍性，将个人化的生存体验和感觉表现出来并获得理解的问题。因此，“语言作为能被理解的存在”与“语言作为存在的牢笼”作为 20 世纪语言哲学大发展以来形成的两大命题，揭示出了在言与意关系上巨大矛盾与张力的同时，也将言意问题引向纵深。从大处讲，该问题可以说直接从哲学中衍生而来，它分别关涉存在、认识与表达这一哲学史上的三大问题；涵盖了古代存在论、近代认识论和现当代语言论这些宏大的视野，是十分有意义的。

同时，意义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前提，体现了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诸多复杂关系。而文学本身即以对意义的探索与理解为己任，因而对该问题的探讨实际具有本体论的意味。同时，文学

中的言意关系早已不限于文学作品构成的环节，“言”与“意”的问题显然也已经跃出了文本的审美层次结构的关系，而涵盖了从世界到作者创作、作品构成以及读者接受的文学活动的全过程。因此，该论题实际涉及语言与本体、语言与认知、语言与表达、语言与价值等众多社科领域的重大问题。文学中的言意关系的变化实际上又可以看做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哲学和文学理论中心悄然变化的深刻折射。因此，随着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和语言学转向，这一传统命题在当代又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对此，十分有必要借助于语言哲学研究的新近成果，对这一贯穿古今中外的语言问题重新进行综合梳理与比较研究，采取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野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使我们对这一文学活动中长期存在着的困惑或基本问题做出必要的清理与新的解析。

历史上，中西文论和相关文学活动中有关语言问题的思考，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的思想与哲学话语体系中形成的。因此，在对言意关系的探讨中所形成的范畴与理论，也都有自己的文化渊薮和理论背景，在这一问题上，并未真正展开过有效的对话以及综合性的理论研究。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出现了西方现代语言哲学家力图超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取鉴于东方思想的动向；以及国内学者引用西方现代解释学、接受美学等理论对中国传统文论展开重新阐释和解读的探索，在对语言问题的看法上表现出了某种思想上的相通性。

西方自 20 世纪以来，随着人文科学领域发生的解释学和语言学转向，语言取得了本体性研究的地位。在人文科学内部，从语言学、哲学、文学批评、社会学、历史学直到人类学等各门学科纷纷将语言作为研究的切入口，语言问题把各种哲学思潮，从现象学、解释学到分析哲学和科学理论都统一起来了。从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思想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到当代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均反映了科学主义一元论的认识方式的解体，以及超越相对主义的把握世界方式的勃兴。在文论方面，具体就言意关系立论的是波兰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加登的《文学

的艺术作品》一书，书中将文学本文由表及里分为四个基本层次：语词—声音层、意义单元层、图式化观相层、再现客体层，以及一些伟大的作品当中还包含的“形而上质”。英加登的这一理论把内容与形式融为一体，各个层面层层深入、互相沟通、互为条件，可以说是西方文论中对文本“言、象、意”审美层次结构关系的经典论述。此外，他指出文学作品这一再现性客体作为一种图式化的结构，它区别于真实客体的关键特征在于包含着无数未定点（未定之处），这令阅读（具体化活动）进入到文学本体当中，对西方现代文论有着重大影响。回溯西方历史，从古希腊至今，又有多少哲学家、思想家、文论家和作家在不同时期，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对该问题做了各具智识的贡献，实难一一道说。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本领域内作专门研究的要首推旅美学学者张隆溪早年所著的《道与逻各斯》一书，通过成功解读中西方文艺作品中的若干经典个案，阐发了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所共同关注的经典书写与理解和阐释之间的困惑与矛盾，有力地揭示了思想与言说的二重性关系，以及在思想、言说与文字之间的形而上学等级秩序背后，是共同主宰东西方诗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作者对外文著述的熟稔程度，以及对言意二重性矛盾背后主宰思维方式的成功道破至今影响深远。此外，海外学者叶维廉所著的《中国诗学》，跨越古今中西，运用解释学的新视角、新方法，重点解析了汉语及汉语诗学传统的独特思维方法及其美学个性，对于汉语言及汉语思维的表意和形象化的诗性特点予以了深刻的揭示，堪称经典，带给笔者以极大的启发与触动。国内学者鲁枢元所著的《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一书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文学话语特性专门立论的，该书针对现代语言学的主导潮流——结构主义语言观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直接套用这一倾向，重点论述了文学是语言还是言语的命题。揭示了人的生命活动和精神生态与文学言语的内在联系，突出了文学言语的“个体性”、“心灵性”、“创造性”和“流变性”的特征。阐发了言语对文学而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巨大意义，从根本上阐明了人们常常说到

却很少深究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本质所在。进而探讨了人类对于语言的突破与超越的必然性等理论问题，就关于建立文学言语学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独到见解。近几年来，汪正龙的博士论文结晶：《文学意义研究》一书可以说是立足于现代语言学大发展的背景之下，围绕该问题所做的专门梳理和解析。它从作者赋意、文本传意和读者批评家释义三个释义维度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着手，进行了详细论述，并提出了一个能够运用于文本分析的关于文学意义的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论构架。该书采用了哲学、语言学和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透视文学的意义构成，显示出了较为宽广的理论视野和较强的理论深度。

上述研究从各自不同的知识结构出发，围绕着相关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或侧重于从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的角度，对中西哲学、中西文化各异的思维方式做了深入的比较；或从中国古代文论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汉语及汉语思维的“写意”特点做了有益的评述；或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中西文论做了有效的梳理，试图建构起古今、中西文论对话交流的框架。可以说分别从材料上或从观点路径上对该论题的深入推进，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启示和推进作用。然而，以上研究多形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囿于当时学界对西方文艺理论思想引进和运用的水平，在对这一问题的最终揭蔽上逐渐显示出一定的缺憾和不足：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论述言意问题的专著，能够立足于当今哲学、语言学理论大发展的背景之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丰富的语言思想做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新的解读，真正建构起中西方语言和文化之间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如就形成言与意之间矛盾与张力的本源问题，以及就文学作为“世界一人一语言”这一图式中的交叉核心，文学话语所特有的价值和特征是什么等问题，并未能从哲学本体上阐释清楚，其理论视野难以覆盖到当前西方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而随着当前哲学、美学方法论的进一步革新，以及对文学自身规律的进一步掌握，这一始终存在于哲学、文学领域中的根本问题在当下焕发出崭新的理论生命力，显示出尤待

继续掘进的空间。

笔者认为，通过破解这一长期存在于哲学、美学领域中的困惑，可以打通中西、古今思想文化之间对话的关节，并在相关的一些文学命题上取得汇通融合的启悟。从这一目的出发，本书在撰写上并未采用常规而稳妥的历时态的梳理建构方式，即依据从古至今文学领域中的言意关系的变化来构成全文的梳理脉络，完成从语言工具论到本体论再到实践论的理论建构。带着对以上问题的探寻与解答，全书在前言部分只对古今中外文学创作实践以及理论中心的转移，所折射出的言意命题的变迁，做了全景式的扫描；而把重点放在对形成言意之间矛盾与张力的根源，以及在与世界和人的本质关联中，文学话语所显现出来的特殊功能和价值的揭示上。全书在方法上采用哲学、语言学和文艺学相结合的手段，试图从语言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俯瞰文学界这一核心命题。

由于中国“道”的“去言离相”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古典时期就语言与本体、语言与思想等关系的论辩在先秦至魏晋就两度达到了高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自魏晋以后“语言”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本上长期移植西方的语言工具论思想，在语言研究上没有再呈现出什么新的创见；而西方的情形恰恰相反，在古典时期，对本体的探讨同样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心，而语言作为思想表达的手段和创造世界的工具，却基本被看做是与思想同一的，在语言、思想与存在三者的关系上并未产生过多分歧。直到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以来，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还存在着语言，因而对语言的分析与阐述从一种哲学研究前的训练、准备，转而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继而从语言的层面上去探讨一些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和认识论问题，语言取得了一种本体论的地位，由此影响和推动了诸多文学艺术新方法和流派的诞生，成果倍出。因此，全书分别从中西两条线索入手：一条是西方现代关于语言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又重点辨析、清理了对西方现代语言哲学两派传统和阵营分别产生出巨大影响的思想大家——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二人的语言哲学之

思；另一条是中国古代语言理论的丰富成果，其中主要以儒、释、道三家为代表。通过择取以上中国古代与西方现代最富代表性的的语言哲学成果，来展开古今中西的对话交流，在综合辨析各自的理论渊薮与新近发展之后，最终得出自己关于文学话语中言意关系的见解。

本书力图突破大多数研究一概从文本内部的审美层次结构出发论述“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跳出了只对文本做内部语音、句法、结构等修辞学研究的局限，立足从人类认知和理解的基本范式入手，抓住“象思维”这一文学、美学乃至人类哲学活动中最久远也是最具活力的思维方法作为突破口。将西方现代的现象学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观物取象”、“现量直观”等认知方式结合起来，揭示出“象思维”（形象化的思想）乃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认知、表达与理解的方式，是抽象思维得以孕育的原发性场所。无论是在整个人类还是个体的认知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象化的思想不仅始终是与逻辑理性不相割离的，而且象与象思维的审美创造力反倒能够将人引入无限广阔的理性领域。实际，这种形象化的（意象化的）思想和语言不仅仅存在于文学艺术领域，还广泛应用于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活动当中。在人类理智或哲学一味循着科学逻辑主义的道路陷入困境之时，正是这种原初的思想形态不断赋予我们向原初创造力回归的生命力。

人类原初的自然语言在分化衍生出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之后，这种二元性的工具论语言观及其思想就大行其道，语言与人、语言与存在、语言与思想的原初的亲缘关系就此失落了。文学面临的正是这样双重的困境：首先是长久以来由于工具性、应用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及其语言观所导致的人与语言、人与世界、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以及由之而来大行其道的“意义先验论”所造成的从思想到声音再到文字的逻辑等差。其次是伴随着这种外部强大的形而上学的主体性思维的冲击，文学同时还需应对来自自然语言内部材料有限的挑战。对此，文学选择坚实地走一条尊崇形象的道路来寻求突破，这是一条源自人类自然天性的凡俗的表象之

路，也是一条旨在恢复和重建语言原初价值的道路。

诗性智慧所特有的“象”思维的非概念性和流动转化的特点，以及其兼具物理与精神的双重属性，使它能够超越主客二分式的知识命题和主谓式语言，跨越虚实、有无的界限，自由地游走于精神与实体之间，沟通起主客、物我、在场与不在场、有限与无限的差别与对立，从而将不可说的（不在场的）通过可说的（在场的）带向世界。在对世界真相、本源的接近上，由“象”所构成的艺术性的诗与思的方式更胜于由概念、命题所构筑起来的抽象的逻辑体系。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这两位对20世纪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大师，各自花费毕生精力致力于语言哲学上的思考，最终无疑想要告知我们的是：真理就寓于现象之中。他们二人后期都主张摒弃一种应用性的工具式的语言观，而要求返回到人与语言的本质关联当中。而文学正是在对“现象”的营造中令真理得以丰富多样的呈现，使人返回到人生诗意的境界。只有文学才能担当起使语言还原其原始的本真形态，恢复人与语言、世界的本质丰富性关联。能够带领人们实施这一返回步伐的、使人返回到人生诗意境界这一神圣使命的只有文学。真正的语言就应该是与人的存在直接相关的，是人的精神、情感、灵魂归依的终极寓所。人在这种最本真的语言之中言谈着，把自己敞开到事物中去，在指向着物、解蔽着物，还原出世界整体关联的万千气象的神秘意蕴之际，也就实现着人之为“会说话的动物”的真正要义。这是文学语言有别于那些工具性或应用性的语言之所在，也是文学语言努力挣脱语言的樊笼，实现其自身价值之所在。因此，文学语言的超越性首先就体现在这种诗思合一的状态上。

文学话语的特殊功能与价值还体现在，通过“象象生象”的创造机制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新的存在来，从而达到对语言自身有限性的超越。当自然语言逐渐沉沦为空洞的语言游戏或是闲谈之际，科学语言沿着理性的道路不断抽象为数理逻辑符号之时，诗的言说却从未屈从于语言材料的有限和语用模式的固定化这一语言现实，它不断接受着来自人们精神和情感的

挑战。这一探索的过程不仅仅是通过打破语法的固有规则，并且是通过创造出丰富无穷的“象外之象”与“言外之意”来做到的。文学话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永远不满足于陈述已“有”的东西，而能够依托于隐喻思维这种“先于逻辑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使诗的意象成为存在的源头。同时，文学话语又总是能够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亦即不断打破自身的逻辑规定性中，从“有”入于“无”之际不断创造出新的意义来。因而语言的“有”在这里恰恰是作为界限暗示出那作为背景的深广的“无”。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诗性言说的丰富性能够超越语言本身已“有”的局限，从而使“可存在”不断地从“无”中绽放出来。也即在入于“无”之际，反而将一个“可能的”世界端呈出来。语言本身所构成的牢房，语言逻辑所设定的界限，恰恰只有这种“前逻辑”的诗的语言才能够打破，这就体现为文学话语凭借“象思维”成功实现“有”（有限之言）与“无”（无限之意）之间的生成转换。

诗的语言深入到一切非现成的存在之敞开状态，让真理自行闪现（显象）并自行道说。存在本身自行显现（澄明）并自行隐匿（遮蔽）的特性，使它在现象上永远呈现出有（在场）与无（不在场）的动态运动，而这种运动本身恰恰又构成了言与意之间的永恒动能和张力。我们从存在、语言与人的本质关联入手，可以揭露造成言与意这一对矛盾表象的深层根源：存在本身自行显现（澄明）并自行隐匿（遮蔽）的特性，使它在现象上永远呈现出有（在场）与无（不在场）的动态运动，而这种运动本身恰恰又构成了言与意之间的永恒动能和张力。诗的语言自身的这种揭露与聚集（显与隐）的二重性，本身就是合于世界澄明与遮蔽（有与无）的二重性运作。

此外，由于人（此在）在世的时间性与有限性构成了“此在”的历史性生存的极限经验，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存在”本身也是有限的。因而文本的意蕴随同每一位此在得到敞开之际又难免形成遮蔽，作品的意蕴因而就既不可能只是作家艺术天才的主观预设，也不可能是由文本自身所能有

限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在者。而文学作品的敞开或澄明不是一次性的结果，而是无限次的过程，因而作品的意蕴（真理）其实是一个不断敞开去蔽的展现过程。因此，文学语言的超越性的另一种表现就体现在，文学以其丰富立体的话语系统实际构成了一个开放的结构，文学作品能够通过固定和有限的文学意象及话语形式去召唤着无限次的去蔽和意义的生成。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艺术作品通过词语首度命名的力量不仅仅实施了一种开端和创建，而且还通过鉴赏、评论、诠释的形式达到对存在之真理的有效保藏。作品的（真理）意蕴不仅保存在作品之中，它还经过文本，在作者、读者、世界当中得到流传和增生。这样一来，文学语言又通过其开放性而超越其自身的有限，文本的意蕴得以在无数次去蔽中不断涌现和生成，从而在历史长河中获得其无限的生命力。正因如此，文学文本凭借其话语体系的开放性，将我们从文本内部导向了作者、读者以及世界之间的多元对话与交流，进入语言与人、世界这一意义生成的源生性领域。因此，一经打碎日趋陈旧的语言工具论的“枷锁”，超越由“言、象、意”所建构起来的作品内部的审美层次结构，坚持投入生活，倡导多元对话与交流，便能在个人实践的有限性与人类生活的共同性，以及感受的个人性与语言表达的普遍性之间找到平衡与突破，由此取得一种广阔的研究视阈和方法。

全书的写作立足于当今哲学、语言学理论大发展的背景之下，通过引入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美学的方法论，将之与中国传统丰富的语言哲学、文学理论展开对话与交流，冀图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丰富的语言思想做出有益的当下解读，从而为深入解析这一文学经典命题提供新的理论增长点。在论述过程中，笔者并非简单套用西方话语模式或将其“移植”到中国传统文学命题的研究中，而是力图寻求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之间的双向汇通与融合，达成中西思维方法的有效对话与交融。力图打破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原有省去推理只以感悟、印象式的结论作结的缺憾，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化转换以及构建中

西思想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做了一定的尝试。在行文中，也力图能够以该问题为核心拓展开去，对文学领域中的诸多相关问题形成多元统摄和关注。然而，由于本论题分别涉及了中西哲学中最为精深的心、物关系以及不同的现象直观方法，诸如中国周易的“观物取象”、庄子的“玄览”、禅宗的“现量直观”，以及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二人不同的“现象学”运思，虽然在行文过程中笔者付出了巨大的心力，然而限于本人目前所能达到的学识水平，在综合辨析中仍感到存在着极大的不足，对这一论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尚需与学者同仁一道再作进一步掘进。

目 录

前言 对语言的功能与地位的反思	(1)
第一章 海德格尔：“大道”与“道说”的遮蔽与澄明	(14)
第一节 对“存在”的追问：嵌入“无”之中的此在的超越	(15)
第二节 解蔽(Aletheia)与聚集(Logos)：有与无的转化	(21)
第三节 诗与思：通往“返乡”的表象之路	(35)
第二章 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分析：“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	(44)
第一节 早期的逻辑图像理论	(45)
第二节 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	(49)
第三节 从过度分析回归到基于现象的自然理解	(54)
第三章 儒、道诗学：“言”与“意”的博弈	(61)
第一节 儒家诗学：“立言”的传统	(62)
第二节 “立象以尽意”与“赋、比、兴”的肯定性创建	(64)
第三节 道家诗学：“贵意”的立场	(70)
第四节 “道不可言”与“重言”、“寓言”、“卮言”的否定性言说 …	(72)

第四章 玄学、禅宗诗学：“忘言忘象”与“佛以意解”	(79)
第一节 儒道合流：“得意忘象”的玄学之风	(79)
第二节 禅宗：“不立文字”与“不废语录话头”的悖谬	(83)
第五章 儒、释、道诗学的合流与创新	(94)
第一节 “象外之象”、“境外之境”——意境	(94)
第二节 汉语和汉语思维的特点	(100)
第三节 汉语文化的诗性传统	(106)
第六章 中西诗学的对话与交流	(116)
第一节 跨时空的对话与交融	(117)
第二节 差异与启示	(133)
第三节 会通以超胜：象与象思维	(142)
第七章 文学语言的超越性：有与无的生成转换	(155)
第一节 语言是原诗	(155)
第二节 文学语言是创造性的语言	(158)
第三节 象象生象——文学语言超越性的内在创造机制	(162)
第四节 境生象外——文学语言超越性的外在生成机制	(166)
结语 文化与意义的世界	(174)
参考文献	(178)
后记	(191)